

两枚抗战钱币里的山河记忆

□郭学军



到近乎简陋,却像一个沉默的句号,圈住了那个年代人们对和平的全部期盼。

翻阅史料便知,这类抗战时期的地方法币,多诞生于艰苦卓绝的相持阶段。那时,日寇对我国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妄图通过切断物资流通、破坏金融秩序,瓦解我方的抗战根基。为打破封锁,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创办小型铸币厂,用铅、锡等易得的廉价金属,铸造出这些“土生土长”的钱币。它们没有统一的模具,没有精湛的工艺,甚至连合金比例都难以精准把控,却在物资匮乏的岁月里,撑起了根据地的经济运转——农民用它购买农具,商贩用它周转货物,儿童团的小战士们,或许也曾攥着几枚这样的“五分钱”,为前线送过去一封封带着体温的家书。

我与这两枚特殊钱币的缘分,始于三十年前的一次下乡走访。那时我刚接触收藏,总想着寻觅些“大开门”的珍品,却在皖北一个偏远村落的老乡家里,偶遇了这两枚被遗忘在木匣角落的“破铜烂铁”。老乡说,这是他爷爷留下的物件,当年爷爷是村里的货郎,抗战时曾冒着炮火,给山里的游击队送过盐和药品,游击队的同志便用这些钱币付了货款。后

来爷爷把它们小心包好,藏在箱底,说“等抗战胜利了,这就是念想”。如今,货郎爷爷早已作古,木匣里的衣物早已腐朽,唯有这两枚抗战钱币,在岁月的侵蚀下,表面生出一层青灰色的包浆,如同披上了一层时光的铠甲。

这些年,我见过无数价值连城的古币,它们或是皇家用过的金铤,或是名家雕刻的钱钱,却始终不及这两枚抗战钱币让我动容。因为它们身上的每一处痕迹,都是战火与生活的印记——钱币边缘的细小磕碰,或许是当年货郎担在崎岖山路上颠簸所致;正面“战”字的笔画略有模糊,可能是无数人擦洗传递时,掌心的温度与汗水留下的印记;背面的圆圈边缘虽不完美,却凝聚着抗战时期工匠们“哪怕条件简陋,也要支援前线”的赤诚。铅锡本是廉价金属,可当它们与“抗战到底”的誓言结合,与千万军民的抗争史交融,便不再是普通的钱币,而是镌刻着民族精神的“活化石”。

如今,盛世之下,收藏市场热闹非凡,天价拍品屡见不鲜,人们追逐着文物的经济价值,却有时忽略了它们背后的历史重量。这两枚抗战钱币,或许在收藏市场上难敌金银古币的身价,却有着无可替代的“精神价值”。它们不像

博物馆里的文物那样隔着玻璃展柜,而是能被我们捧在掌心,清晰触摸到岁月的纹路,感受到当年军民“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壮志豪情。当我们凝视“抗战到底”四个字时,看到的不仅是钱币上的文字,更是无数先烈用生命践行的承诺;当我们掂量这16.6克的重量时,感受到的不仅是铅锡的密度,更是一个民族在危难时刻凝聚起的磅礴力量。

藏物易,藏史难;藏史易,藏心难。这两枚抗战钱币于我而言,早已不是一件普通的收藏品,而是一位沉默的“历史见证者”。它提醒着我,盛世收藏的意义,从来不止于囤积珍宝,更在于传承记忆——让那些镌刻在器物上的岁月,不被时光淹没;让那些融入血脉的精神,不被时代遗忘。今日将其披露,愿与各位藏友共赏,更愿与每一位铭记历史的人共勉:莫让铅锡蒙尘,莫让记忆褪色,因为每一件从战火中走来的文物,都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坐标,都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力量源泉。

山河今已无恙,钱币犹存余温。愿这两枚抗战钱币在盛世涛声中,继续传颂不屈岁月,让世人铭记:我们收藏的不仅是文物,更是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养就胸中一段春

□陈邦元

李鸿章故居走马楼门旁有一副楹联,据说是李鸿章亲自手书的:“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处世智慧,读后令人难忘。上联描绘了李鸿章宦海生涯中经历的种种复杂境遇,下联展现出李鸿章对人生的一种豁达与超脱的泰然心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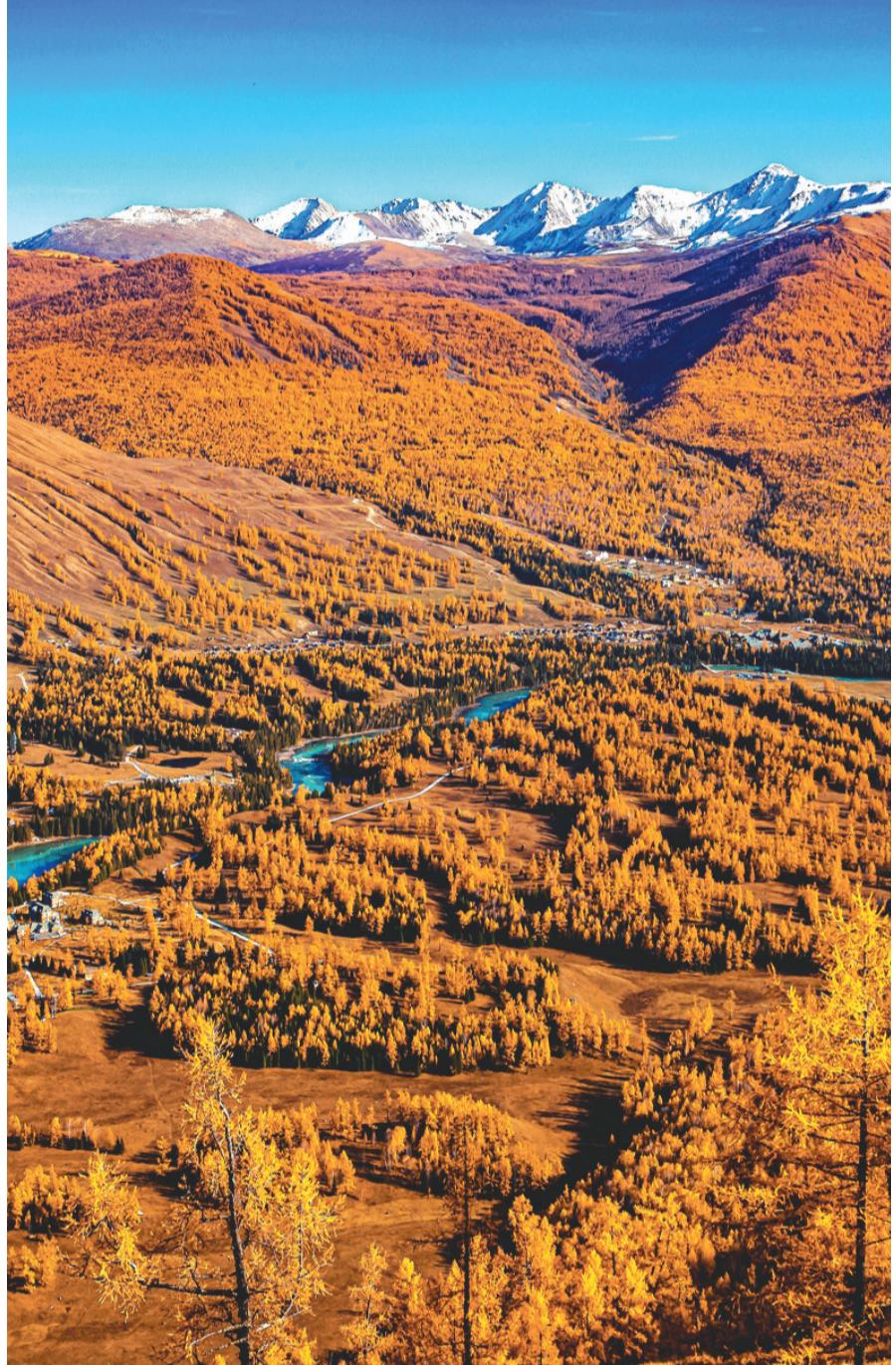
李鸿章继室赵小莲是安徽太湖人,李鸿章去世后,没有与正室合葬,而是与赵小莲合葬,足见李鸿章是宠赵小莲的。作为一名太湖人,在李鸿章故居看到这副楹联时,百感交集。一个李鸿章,半部近代史。

李鸿章1901年11月去世,两个月后梁启超就完成了《李鸿章传》的撰写,梁先生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并声言: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去世100多年了,依然中国近代史上最富争议的传奇人物,有人说他是中兴之臣,有人说他是卖国贼。我想用贴标签的方式是难以客观评判像李鸿章这样复杂历史人物的。李鸿章晚年对自己的一生作过反思,自嘲“我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这倒很有意思,一说明他有自知之明,二说明他可能有太多的无奈,不能言说的苦衷。

我对李鸿章没有研究,依我有限的中国近代史知识,倾向于梁启超先生对李鸿章的评价,李鸿章尽管在晚清政坛纵横捭阖,但在衰败腐朽的制度中终是碌碌无为,这既有时代的制约,也有自身的局限,李鸿章际遇值得我们后人深思。

李鸿章是有识的。他较早看到了中国农耕文明遭遇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提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观点。1872年李鸿章在给同治皇帝上呈的《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提出“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中国,此三千年余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看到了西方列强扩张导致中国被迫卷入国际体系,全球势力汇聚中国,构成中国三千年未遇的巨变这一时代变化,呼吁中国要自强、要变革,要打破中国地理与文化隔离,要学习西方科技与军事优势,为洋务运动推行提供了理论基础,成为近代中国转型的起点。面对列强的虎视眈眈,李鸿章为挽救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做了许多努力,不遗余力推行新政,开展洋务,创办



大美山河

汤青 摄

律诗八首

□陆震日

G3铜陵长江公铁大桥通车

万里长江涌大潮,铜官晴翠逼云霄。
东风直与羊山便,一里飞虹再起桥。

天井湖

古井通江海,铜雕道德文。
青荷招远客,佳气接纤云。
阁晓千芳苑,风撩百褶裙。
诗仙惭食地,八宝喜迎君。

农林深处静闻香

沿途桂子撒金黄,岭上红枫并日彰。
欲问今朝何得趣,农林深处静闻香。

山村有见

古树藤蔓滚石泉,松花竹影白云翻。
丝瓜已作龙钟态,自结经纶不赚钱。

草原牧影

丘原牧影小蛮腰,信马由缰且自豪。
竹笛羌歌频醉客,长鞭一甩白云飘。

黄山挑夫

登山谁不累?更看那挑夫。
莫问年庚事,银丝滴汗珠。

环卫工

身披红马甲,汗水洒城垣。
得个年终奖,全包给小孙。

退休后

退休仍发几分光,斗室盘营小作坊。
礼待亲疏吴起信,情怡老少紫丁香。
无需换鸟腾笼技,免问行南闯北商。
亦拾余闲邀月饮,黎明启户又开张。

一面照见人性的镜子

——读《傲慢与偏见》有感

□林积才



《傲慢与偏见》是英国十八世纪末最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家简·奥斯丁的巅峰之作。她曾谦逊地形容自己的创作:“好比一件三英寸大小的象牙雕刻品。”精致、细腻、匠心独运——这不仅是对她艺术风格的精准概括,更道出了这部作品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它宛如一面清澈的镜子,映照18世纪末英国乡村百态,折射人性幽微的光影,在时间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成为不朽的经典。

要真正读懂《傲慢与偏见》,便不能脱离“知人论世”的视角。作者简·奥斯丁(1775年—1817年)出生于英格兰汉普郡的牧师家庭,有五位兄弟与一位姐姐。父亲乔治·奥斯丁毕业于牛津大学,家中藏书丰富,文化氛围浓厚。长兄詹姆斯对文学的热爱深深影响了年少的简,使她在耳濡目染中萌发了写作的兴趣。十六岁执笔,二十岁完成《理智与情感》初稿,二十一岁时便写就了《第一次印象》,这正是《傲慢与偏见》的雏形。然而,这部被誉为“19世纪最有影响的经典文学之一”的小说直至1813年才得以出版。四年之后,年仅四十一岁的奥斯丁溘然长逝。她生前并未获得广泛声誉,直到生命最后一年,才开始被文坛真正“看见”。个中缘由,或许正因现实主义小说在十八世纪末的英国尚未被充分重视。尽管生命短暂,她却留下了六部完整小说与一部未竟手稿,每一部都如精雕细琢的宝石,闪耀着智慧与洞察的光芒。

《傲慢与偏见》以班纳特家五个女儿的婚恋为主线,编织出一幅关于爱情、阶级与人性的斑斓图景。书中描写了四对截然不同的婚姻,如同一个微缩的“人间婚恋万花筒”,在轻松诙谐的叙事中,展现出深刻的社会观察与心理剖析。

彬格莱与吉英是善良的婚姻。彬格莱出身世家,性情温和,待人热忱;吉英美丽端庄,温柔敦厚。二人一见倾心,情感纯粹而真挚。然而,彬格莱的炽热情感与吉英的含蓄内敛,在旁人眼中却成了误解的源头。一个看似轻浮,一个似有保留。幸而误会终得化解,两人重归于好,以真诚与善意筑起婚姻的基石。

达西与伊丽莎白是理想的婚姻。达西出身贵族,仪表堂堂,却因教养环境而显得冷漠孤傲。他曾坦言:“我从小被纵容自私、傲慢,从八岁到二十八岁,都受这种教养。”而伊丽莎白聪慧独立,言辞犀利,不趋炎附势。她之所以打动达西,正是因为她“不像别人,只为博得称赞”。在彼此的碰撞与反思中,达西学会了谦卑,伊丽莎白放下了偏见。他们的爱情,建立在自我认知与精神共鸣之上,是灵魂的契合,是成长的见证,最终跨越阶级与成见,步入婚姻的殿堂。

《傲慢与偏见》亦如此。它不写战争,却写出了人心的战场;不写革命,却完成了对偏见与傲慢的内在革命。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爱,始于自我认知,成于彼此理解。正如书中那句隽永的箴言:“傲慢让我们无法去爱别人,偏见让别人无法来爱我们。”

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情绪先行的时代,再读《傲慢与偏见》,我们依然能从中获得启示:唯有放下成见,倾听内心,才能在纷繁世界中,寻得那个真正懂你,值得你爱的人。

铜官风



钱松 作

己是黔崖百丈高
春归犹见小草青
枝梢嫩叶待春来
木秀风高自见高
春暖花开喜见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已是悬崖百丈冰
铜官山

王一大 作

铜官山